



2018年注定是一个被记住的特殊的年份,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电视剧创作也是成绩斐然的一年,一大批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作品跃然荧屏。温故而知新,每年的回顾总结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电视剧的审美发现和创新精神永远在路上。

高小立:2018年电视剧创作迎来了现实主义创作高潮,尤其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回归,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实主义创作路径,这一创作现象意味着什么?谈谈你对2018年电视剧创作的总体印象。

赵 彤:在去年电视剧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实主义回归”的说法随之而生,2018年可以说是进入了“加力”阶段。我觉得聚焦现实题材、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是艺术创作思潮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社会风尚和观念的表现。它是今天人民群众积极关注现实、热情拥抱生活、努力创造美好未来的“人世”情怀在电视剧艺术领域的展现。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大功效,还不在于某一年出现了多少部优秀作品,而在于这种脚踏实地的气象的蔚然大观,有了这样的观念基础和文化土壤,会孕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2018年,我国电视剧收获颇丰。《换了人间》以新的视角讲述新中国的初创历程;观众,特别是高级干部从《初心》里能看到甘祖昌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将军品格;《归去来》在“留学”和“守心”的矛盾价值中,将青年一代价值选择的焦点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之中来关注;《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以接力形式塑造的群像型县委书记前所未见,久久难忘;《大江大河》展开改革开放初期故事的广度和深度,描摹时事、世态、性格和命运的精简与细腻,使它不仅在本年度成为翘楚,在近年来的作品中也是上乘之作。

2018年,我国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成绩,因为中国梦主题的延伸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更为广阔和深入地开掘了当代中国这一矿脉,为“守正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小立:2018年最值得探讨的热点就是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献礼剧,从下半年开始,央视率先推出农村改革剧《岁岁年年柿柿红》、弘扬塞罕坝精神的青春剧《最美的青春》,各大卫视紧随其后,截至年底共推出近30部献礼剧,其中大部分是年代剧,也有直接进入当下描写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剧,你对这批剧的评价是什么?

赵 彤:2018年反映改革开放电视剧的题材和风格是丰富多样的。从题材选择来看,诸如《最美的青春》《黄土高天》《创业时代》《大浦东》《江河水》《那些年我们正年轻》《风再起时》等,带领观众略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农业、金融、互联网、航运、航天、纺织行业的发展历程;从故事时限的选择来看,“改革通史剧”所占分量比较大,但也有阶段型的作品,比如选取改革之初的《大江大河》,选取自“文革”到“南巡讲话”之前的《外滩钟声》,选取十八大之后的《北部湾人家》和《启航》,从内容和地域的关系看,大致是西部写村、东部写城,南方写商、北方写农,各干各

电视剧:高扬现实主义

□高小立 赵彤

的,界限分明;从故事主角的性别设置来看,以男性英雄为主角来讲述改革故事的占绝大部分,但也有《岁岁年年柿柿红》《正阳门下小女人》这样的“改革题材大女剧”;从角色体系的年龄段来看,改革题材作品基本上都是以“80年代新一辈”为主角,唯一看到的一个例外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主角都是“90后”一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继续改革的任务注定要落在新一代年轻人肩上。这部作品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提示。

高小立: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创作中,也有遗憾。年代大剧都存在一个问题。苦难年代被描写得厚富质感、人物性格丰富饱满、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可一过上好日子,人物表演、台词、性格就趋于平面化,甚至是口号化,从而降低了艺术的感染力,形成了半部好戏的现象。

赵 彤:还有两个遗憾,一个是侧面“改革”的作品多,对“开放”描写得单薄;另一个是,描写我军当代新军事变革的作品成为空白。

高小立:庆祝改革开放可写的题材内容太多了,就是300部恐怕也写不尽。改革开放40年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这些作品在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挖掘是否出彩,人物是否典型,比如我从《岁岁年年柿柿红》中的女主角柿红身上能感受到她的精神成长轨迹,你认为能留下的人物还有哪些?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与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联合推出2018年电视剧代表作品:《大江大河》《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最美的青春》《黄土高天》《初心》《江河水》《岁岁年年柿柿红》《外滩钟声》《归去来》《延禧攻略》(排名不分先后)



赵 彤:尽管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他们的事还没讲完,却已然由目前这段《大江大河》让人萦怀不去。特别是宋运辉,这是我们近年来少见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是改革开放题材中唯一作为正面主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踏实、执着和敬业精神,将所有的浮躁、浮华都比成了泡沫。梁怀远、唐永年、齐距明、谢常润这几位右玉县的“关键少数”,为什么能够带领起大多数群众?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少数”。甘祖昌是个“想法简单”、“一根筋”的老顽童,他心口如一的初心是一生为党,一心为民。还有《江河水》中的秦池,这个前期改革的“功臣”蜕化为继续改革的“佞臣”,不显山不露水地利用规则谋私利,把继续改革的艰难演绎了出来。这个负面形象在改革题材中塑造得别具一格。

高小立:欣喜的是,几部农村剧《岁岁年年柿柿红》《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黄土高天》拍得相当不错。

赵 彤: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农村故事中的一个基础矛盾是与大自然搏斗,这也是我们文明发端的初始情境。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与自然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故事。大禹的形象奠定了我们民族敬仰崇高的精神品格和美学

观。通俗文艺作品的观众也是自带崇高需求的。当一部作品扎实地呈现出角色的崇高品格,观众自然会折服、认同的。《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描写的是抗风沙的故事,贴着地皮写崇高,写的有基础、有底气、有感情。这里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的形象蕴含着我们最古朴的文化情感。

高小立: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还要以优秀的作品向祖国献礼。献礼是一个时间节点,但不是题材,献礼剧本身就是质量上乘的好剧,观众对献礼剧的审美需求和所有好剧是一样的,所以在创作中不应该过多考虑能不能献礼,要尊重艺术本体,按电视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避免宣传大于艺术的问题。比如2018年口碑最佳的《大江大河》,就是一部倚重文学精神、注重塑造人物、用细节还原历史难得的好作品。比如《外滩钟声》,并没有写时代的弄潮儿,聚焦的是生活在上海弄弄的小人物“守”和“闯”的不同人生经历,写出了他们只要听到外滩的钟声就会迎来朝阳的希望的一种人生态度。而《江河水》直面国企改革,不回避改革中尖锐的矛盾。包括聚焦互联网创业



的《创业时代》。

赵 彤:在时间节点上的献礼,这是特别礼物,不仅我国相沿已久的传统是这样,在其他国家逢十的周年也是如此,方式略有不同。在日月月年年的时间流中,把每一部作品写好、拍好,精益求精地打磨好高质量的多样作品,这是日常的献礼。没有平日里的兢兢业业,到了周年节点上也就难免慌慌张张,没有金刚钻却要揽瓷器活,难免会把“献礼”作品弄成“现眼”作品。今天的中国电视观众积累的国内外电视剧观赏经验太丰厚了,可以说一眼就能辨别出良莠,《大江大河》之所以能胜出一筹,全在于基础扎实和功夫深厚。从新中国成立10周年开始献礼创作,到今天也有60年历史了。我们从事献礼创作也应该上水平、上台阶了,对献礼的内涵应该把献成就之礼、献成长之礼和献成熟之礼结合起来。

高小立:2018年电视剧创作的另一个热点就是古装剧,《延禧攻略》成为真正的爆款,开始一听宫斗剧我是立马拒绝,因为播得太热还是看了,好像和纯粹的宫斗剧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女人为姐姐报仇在后宫被荆棘的故事。我认为《延禧攻略》,包括《如懿传》,最大亮点是服化道的精美,尤其是《延禧攻略》中对非遗的传承下了功夫,莫兰迪色的运用一改于正以往古装剧服装

的艳俗,莫兰迪也成为了今冬的流行色。《天盛长歌》也胜在精良的制作上,思想立意略胜一筹。

赵 彤:2018年,一大批古装宫廷剧播出,《延禧攻略》是其中最火爆的一部。它以魏璎珞“探案”为由头,展开了与其他同类作品相去不远的故事。主打女性观众群体的作品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主,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要尽量不重样地演10台戏,就得30多个女人,这么多人物荟萃的地方非“后宫”莫属。在后宫里,上至六七十岁的太后,下至十六七岁的宫女,中间夹着自20至40岁的后、妃、嫔以及嬷嬷、管事等,几乎将各年龄段的女性一网打尽,对女性观众几乎是全年龄覆盖,且遥控器又掌握在女同胞手里,效果很明显。莫兰迪成为了今冬的流行色,明年春天也可能就不流行了。明年汤换了,药不换,不知道浸溺在“后宫”氛围中的观众觉不觉得“珍珠粉”其实是陈年的“贝壳粉”?

高小立:有人喊出了2018年是影视剧创作的寒冬,我认为创作没有寒冬盛夏之分,只有年度好作品的多与少。2018电视剧创作还包括了人物剧《初心》,年代剧《楼外楼》,法治剧《阳光下的法庭》,家庭剧《美好生活》《幸福一家人》《大男



孩》,谍战剧《和平饭店》《面具》,青春剧《归去来》,缉毒剧《橙红年代》《破冰者》等题材类型丰富、创新审美的好剧。作为受众最广泛的电视剧艺术,提高品质仍是第一要义,如何满足电视机前的中老年观众和以手机视频为观影介质的青年观众,是电视剧创作始终面临的挑战。你对未来电视剧创作有哪些期待?

赵 彤:行业在规范,有人不习惯。自行退出是市场主体的自由。2018年的高品质电视剧比2017年还多,冬天之说立不住脚。定向某一观众群,定向投放某一媒质的电视剧都是自觉追求“窄播”的,这无可厚非。但我觉得真正高品质的作品不会给自己建个有限“朋友圈”,优秀的作品自会下自成蹊。

作为建言,2019年的电视剧能不能让家庭成员齐全些、能不能有四季变化、能不能不依赖“绝症转折法”、能不能让剧情紧凑些、能不能少些“总编剧”、能不能……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进入了新阶段,40年改革开放也在70年发展过程之中。汲取2018年电视剧创作的成果,思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的得失,期待在“守正创新”中涌现更多献礼和不献礼的高品质剧。

《春天的马拉松》:创造新农村电影

□张 斌

《春天的马拉松》让人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熟悉,是因为农村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主要类别,《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牧马人》《野山》《人生》等作品,深入刻画了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转型期所经历的冲击与改变,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电影观众;陌生,是因为中国当代电影确乎已经许久没有这么深情地关注过农村了,而且该片所表现的农村与此前银幕上的农村已然大相径庭。农村,正如电影片名所喻指的那样,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式发展,已经奔向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电影呈现新农村的新面貌。与传统的中国农村电影相比较,《春天的马拉松》真实地呈现了一个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面貌,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最新成就和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侧影。

云顶村是一个富裕的农村。这里村居明亮干净,交通道路畅通,老百姓开民宿发展旅游产业,基本实现了安居乐业。云顶村是一个生态的农村。在这里,没有随处可见的垃圾,也没有为了发展经济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有的是层层叠叠的梯田、金黄摇曳的油菜花,雾气氤氲的村子,潺湲流动的小溪与古色古香的民居。云顶村是一个传承的农村。这里不但有美丽幽清的环境,更重要的是,那些滋养农村的传统重新再现。得益于文化下乡和城乡共同发展,云顶村的村民在家里就能观赏到本地的传统戏曲平调,能享受即将建成的文化产业园的服务。而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泥金彩漆,也在传承人的传承中重新焕发光彩,得到新生。云顶村是一个现代的农村。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缩影。在云顶村,通过以方春天为代表的村委会对在基层推行的小微权力清单36条的遵守、执行与违反、惩处等故事描述中,电影比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曾经深受人情亲邻血缘等困扰的



农村基层行政组织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也展现了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切实成效。

电影塑造了新农村的新农民。《春天的马拉松》不仅呈现了当前农村的最新面貌,更塑造了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方春天、向明叔、方婶,乃至马镇长、刘委员等不同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刷新了观众对于农村题材电影主人公的认知。这集中体现在影片的主人公方春天身上。

方春天这个主角不同凡响。作为从云顶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本应该有一种属于他的成功叙事。但方春天三年前在云顶村发展的关键时期毅然放弃自己的生意,回村竞选村主任,要带领村民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方春天身上不仅体现了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生养自己故乡的反哺之情,更生动说明了党对“先富起来的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承诺的兑现和实践。

方春天也要面对诸多冲突与选择。在面对村子里两个氏族之间的利益冲撞时,他突破了“36条”

的规定拆分招标合同修了祠堂前的路,但又坦然承担坏了规矩的责任。在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马副镇长与承包商相互勾结试图逼迫自己就范的斗争中,他用鸿门宴和钢筋架让两人狼狽不堪。在这些选择中,方春天体现出了一个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崭新形象——有底线、有理想、有能力,守规矩、能决断、敢担责。

电影创造了新农村的新叙事。《春天的马拉松》不仅在内容选择、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上呈现出农村电影的新特色,在影像叙事艺术上也有自己的新发展。

《春天的马拉松》在写实的基础上突出了影像的写意功能,注重影像画面质感与构图美学追求,力图追求“影外之像”和“画外之旨”。廊桥、湖心亭、盘山路与梯形田,这些云顶村的自然风光,在导演和摄影师的匠心独运之下,既做到了对物理时空的呈现,又考量了故事的需要。马副镇长与刘委员两次在湖心亭钓鱼密谋,自然美景与丑陋人格格格不入,犹如湖心亭一般孤独自绝。拉开的俯拍镜头尤其强化了观众的这种感受。而方春天的奔跑则中国传统美学中移步换景的方式让观众领略了云顶村的美景。

在叙事上该片运用双线珠串结构,以马拉松通过云顶村和村主任换届两条叙事线结构故事,形成了内外交织的情节安排,中间穿插了方婶闹补贴、祠堂修马路、包工头偷工减料、智斗马镇长、巧理方婶女儿婚事等多个情节,构成了一种带有轻喜剧样态的叙事方式。

影片的结尾,没有参加村主任选举的方春天依然奔跑在自己的“马拉松”路上,而村子里竞选选票中的那一一张张投给方春天的选票,则用民心宣告了方春天的“春天”还将继续,同时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在这影像和声音中诞生了。

专家研讨电视剧《西京故事》

寻找家庭故事的别样叙述

1月16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的电视剧《西京故事》研讨会在京召开。该剧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讲述了罗家人进城创业的故事,通过罗家人在行为方式、思想理念上与城市的“格格不入”,真实还原了乡村家庭与城市生活的摩擦与碰撞。

与会专家谈到,2011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曾推出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时隔两年,编剧、作家陈彦在秦腔现代戏的基础上再度创作,提升为同名长篇小说,电视剧《西京故事》进一步扩充其承载容量,通过罗天福老两口为了孩子上大学不得不进城创业,儿子、女儿在经历就业难、炒股损失、传销诈骗、感情危机以及夫妇经营理念差异、大学学术腐败、务工人员教育、职场尔虞我诈等难关的描写,呈现出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激烈碰撞。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的这一批电视剧作品中,许多作品都选择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叙述,但是该剧努力寻找家庭故事的别样叙述方式,不仅敢于触及社会痛点,例如通过剧中罗天富与妻子慧娟背井离乡的辛酸所折射出的城乡差别,而且努力洞察人性深度,例如农村孩子甲成本来成绩优异,遭受种种挫折来到城市感到不适与迷茫。这种别样的叙述方式,让观众不禁对个人价值实现与诚实守信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关系,改革导致物质极大丰富与社会保障福利滞后的现实,工业社会发展如何对作出巨大牺牲的农业社会进行反哺等问题进行思考。但也有专家认为,剧中以老罗为主线的主线不够突出,庞杂支线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主线的连贯性,从而使剧情陷入碎片化叙事的困境。(许莹)

中国视协青少年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

中国视协青少年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会上,中国视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范宗毅宣读了《关于中国视协青少年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组织机构名单的批复》,并宣布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青少年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成功,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任主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副总编辑孙建平为常务副主任,并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

胡正荣代表新一届少工委组织机构发表讲话,指出少工委一直致力于助力打造青少年艺术领域有价值的艺术培训与推优

活动,为喜欢艺术的青少年和致力于青少年艺术教育的机构提供创造和实现美好梦想的机遇与平台。会上,胡正荣为少工委第一批会员单位授牌,并勉励大家切切实实为青少年教育行业健康发展作出努力。下午,来自全国教育行业的同仁们进行了业务交流,少工委秘书长李毅宣读了协会章程及未来工作计划,大家针对青少年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如何提升业务水平、提高专业素质,利用协会资源为青少年教育行业做好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许莹)